



引 言

思想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接受怀疑。

20 世纪是一个多变的世纪,而20 世纪90 年代,是这个世纪最后归结的缩影和新千年诞生的前奏。20 世纪的社会风向标表明,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纪的下半叶是由‘政治冷战’转向‘泡沫经济’,到世纪末进一步转向‘知识经济’和‘文明对话’的。而左右着人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再是冷战式的二元对立,而是多重文化政治经济因素的‘交互整合’。

不妨说,在政治形态中心话语之后,决定人类命运的已然成为以经济和金融为主轴的‘知识型文明’的较量,并有可能在‘文明冲突’之后走向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对话’。当然,在世纪性的转向中,不仅可以看到经济的迅猛崛起和高度发展,也能看到泡沫现象的不断产生和经济危机的此起彼伏。到了90 年代,不仅有亚洲四小龙的神话,也有中华经济圈逐渐形成的奇迹,更有泡沫经济消逝之后的亚洲金融风暴。

而在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嬗变之外,文化形态上的‘主义’的加速更替也是20 世纪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尤以90 年代为烈。本世纪曾经历了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世纪末的近20 年来,则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少数话语、文化相对主义等‘各领风骚’三五年。旧思想在新世界中迅速土崩瓦解,思想史转瞬之间成为思想家的坟



墓史。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扬弃，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抽空挤干。这个巨变时代所有的‘主义’在转瞬更替之时，都出现了激烈的文化论战和空前的大重组大调整。正如经济膨胀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东西方‘新主义’的排行榜也在快速地洗牌和更迭。

当然，这种经济、政治、文化和主义迅速更替的世纪聚焦点无疑是90年代。因此处理90年代的文化政治经济问题，是相当复杂而困难的。就我的工作平台而言，并非是要处理90年代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所有方面的问题，而仅仅打算以“文化研究”的思维范式作为出发点，从公共空间和个体伦理入手，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作为一种当代‘文化镜像’分析视角，去审理90年代中的文化症候和思想景观，关注被各种主义所掩盖的真实问题，以及问题的前提和产生的后果。

进行‘文化镜像’的分析，乃是借鉴了著名心理学文化学家拉康的‘镜像’概念。其核心范畴意指在人的自我主体心理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主体分化的‘镜像阶段’。人入世时本是一个‘未分化的’、‘非主体的’存在物，此时无物无我，混沌一片。到了其生存史上第一个重要转折点‘镜像阶段’时，则首次在镜中看见自己的形象并‘认出自己’，这是‘主体意识’形成的开始。镜前的自我认识是‘自我’的首次出现，这一过程是‘首次同化’即主体与镜像的‘合一’，也是第一次‘自我异化’。因为此时发生了自我与镜中之我的对立，原始之‘我’似乎被分裂了——触摸镜像时发现‘自我’并不存在，即作为整体的自我有像而‘像’又不存在，这一内在矛盾就是‘自我’的异化。人可以从‘自我镜像’中看到自己在‘世界’中与其他存在物组成了“双边或多边关系”，人再也不可能以自我为中心了，在自我之外有着非自我的无数重要的‘他者’。进一步说，镜像阶段虽然展开了主体形成



的前景,却并未使‘主体’真正出现,因为在镜像中自我只是与镜前之我的‘合一’,还不能和‘他者’分开,或者说‘意识’虽然分解为自身的‘像’,却未能与其保持认知上的间距,彼此之间还存在着无中介的对立。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他者’对照的‘自我’,只不过是一个不真实的自我幻象或巨型想像而已。

循此出发,我将这一理论视角运用于世纪末中国文化的审理(80年代的关键词是‘反思’,90年代的关键词是‘审理’)。这意味着,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对自我社会文化身份的认知,已经不可能是单一的层面,而只能将自己置于全球化浪潮之‘镜’中对自我加以重新体认。这种文化形态上对自我镜像的重新体认,一方面带来全新意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带来面对‘他者’并被他者‘同化’甚至‘异化’的内在紧张。

从事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文化镜像分析,使我不再仅仅局限于书斋中进行问题的构造,而是关注现实若干知识学和文本政治问题。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就开始关注各种复杂问题及其问题背后的话语权力运作,并时时提醒自己透过‘问题’审视“主义”,不要为一些障眼的现象所遮蔽。进而从思想深处进行自我思想清场——开始了从“审父”到“自审”的思想转型。因为,清醒地‘洞悉’问题是写作的基本前提和进入问题的必要条件。如今,那些游戏者之笔已经很多,味同嚼蜡,从新的高度审视转型中的中国文化和世界关系已经变得非常急迫。注意百年文化思想问题的学术史清理,考察世纪末人心人性,透视时代的喧嚣浮躁,并写出世界失魂和人灵出壳的真实轨迹,瞩目世纪之交的关键性问题的总结,对我来说,就变得殊为重要了。

90年代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或许在于,把握9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互渗中,中国文化转型对当代文化思想史和艺术审美史发展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使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与80年



代相比具有了相当的差异。这一研究不仅是跨世纪文化策略问题,更是跨国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定位问题。就此而言,我不仅要重视80年代和90年代的联系和分裂、张力和转型,也要从知识话语的角度去研究9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处于学术和思想之间、经济和政治之间、文化和传媒之间的精神定位,以及知识分子在共识破裂后所出现的种种知识话语论战的局面;还要分析后殖民全球话语中的‘中国形象’和‘文本中国’的解读,透视后殖民主义氛围中的‘国学热’本土化现象、当代的‘说不’问题,以及当代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世纪性论战的思想轨迹;同时,也要辨析西方新历史主义对中国当代问题史的渗透,包括重写文学史和文化史;关注重写女性的心灵史、文化史和艺术史问题,以及在女权主义的渗透下,女性感觉言说方式和私人化写作在今天的意义和困境;至于90年代的文艺问题,尤其是先锋文艺的实验和困境、诗人自杀和散文化浪潮、批评家的分化和事件化、大众传媒和非审美化,甚至世俗关怀、宗教情结和终极关怀的内在冲突问题,自然也是我关注的重要层面,并力求在审理中作出自己的思想判断。

我意识到这众多链状问题的深层次审理,犹如网络的超级链接一样,可能将我引上一条不归路。但我想,只要坚持思想的多元开放性和公共价值的正当合法性,那么即使在进入问题时将寻求‘目的’(获得结论)变成寻求‘过程本身’(不断追问),又有何妨?



第一章 跨世纪文化： 当代语境与问题意识

我们往往震撼于世界的陌生和瞬息万变，又不得不痛苦地习惯于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自我身份的改写。

9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似乎都是一个由“大”到“小”、由“雅”到“俗”的时期。就西方而言，有罗蒂的从大哲学到小哲学之说，有哈贝马斯的从大写真理到小写真理之说，有福科的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之说，有洛奇的从大世界到小世界之说，有利奥塔德的从大叙事到小叙事之说，有新历史主义的从大历史到小历史之说，有后殖民主义的从大写话语到小写话语之说。这种由大到小、由雅到俗的发展趋势，指明当代话语语境的变迁和游戏规则的重设，并使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问题，共时态地横陈于中国学者面前，使任何终极性的问题解决变得不可能。

在商业与权力的合谋中，在科技“克隆人”不断爆出冷门的哄动效应中，90年代的文化在世纪末的冷风景中成为一个“时代征兆”，并在一系列根本性转型中显示出嬗变的历史那充满吊诡的“踪迹”。



第一节 90 年代文化脉动及其阶段分期

90 年代中国当代文化精神不仅集中体现在思想学术、知识型的语言学转向上,而且也表征在文化批评、当代传媒和审美文化的兴起上。对这一转型发生的历史语境、基本走向、价值归属进行研究,具有当代学术史思想史地基清理的意义。

90 年代在不同的人的分析框架中可以分为不同阶段,但在在我看来,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 思想转型的初始阶段(1989—1992 年)

从1989 到1992 年初期,气功型“宗教热”成为民间意识形态,而与中心意识话语共享民间意识空间。事实上,就思想资源而言,90 年代紧接80 年代思潮而来,尤其是1989 年后整个政治转型——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90 年代初期思想处于一种低调状态,所以,将1990—1992 年称为思想沉闷时期,大抵不会有错。其特征为意识话语中心化,政治两极情绪化,学术回归古典化。这一时期,不少学者退回书斋闭门读书,民间出现了罕见的气功热。因此,有人亦称为“气功意识形态”时期。

二 多种价值的骚动阶段(1992—1997 年)

这几年中的每一年又显现出不同的光谱。1992—1997 年无疑是90 年代的主体性构成。这几年,思想进入多元开放范



式，经济进入全民经商模式，文化出现世俗骚动和个体化倾向，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充满欲望活力、充满机会和刺激的“场域”。每个人、每种思想、每种活法都在这历史瞬间转换的舞台上，匆匆往来尔后又迅速替换消逝。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考察以后，出现了新的历史契机，即由意识形态中心化转向了商品经济多元化，经济成为这个时代的骄子。因此，似可把 1993—1995 年的经济暴热称为“商品话语与大众媒体的狂欢时期”。其特征为：经济上商品具有政治话语的权力，横向挪用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现代化成为当代中国的新神话；文化上全面张扬欲望，反现代性和反现实主义性，同时全球眼光与本土意识萌发；文学上出现迷惘的文坛与困惑的创作批评，文学商品话语和文化媚俗化，批评主体解体，传统文学主题失效，读者群体分流，文艺标准失落和规范失序；思想上是多元观取代了绝对主义观，开放多元的心态取代了焦躁的二元对立心态，其结果是话语空间拓展和自由度逐渐变宽。

1993 年在文化坐标上是“欲望膨胀”和“价值倾斜”的一年，是政治沉重感被经济腾飞感剥离的一年。一大批边缘人和淘金冒险者敢为天下先，利用两种制度的“时间差”，一夜之间走进了先富起来者的行列。而后富或后不富者们则沉醉于“是否应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应当让谁先富起来”的无尽争论中。社会经济秩序失衡，暴富和捞一把成为 1993 年最大的金钱想像，而政治想像和文化想像终于让位于金钱想像这位后来居上者。文人们只能退守蜗居，打出了“重建学术规范”的旗号而与经济热潮保持距离。其中，面对下海的引诱和拒绝的痛苦，置身于金钱世界之中的无力感溢于言表。有些文人在金钱股市“热”



与学术规范“冷”之间选择了第三条路,即性文学热——以《废都》^①为标志的陕军东征,成为世纪末性文学的观念先锋。

1994年实为“文化论战”的一年。人文精神的大旗分别由作家“二张”和上海学人高举,其争论的实质在于当代人在“现代化陷阱”和“现代化神话”之间何去何从。张承志选择了“荒芜英雄路”,张炜选择了“我宁愿不要这样的现代化”,上海学人选择了人文理想精神。^②而争论的另一方“二王”(王蒙和王朔),则在现代化神话下走进了利益趋动的现实原则,为社会的每一点进步叫好,并批评注重价值坚守的人文精神的保守落后。但这种文化论战的力度仅限于文人世界,因为关于“现代化的代价和陷阱”的争论,并不影响雅皮士、文化商人、反文化英雄们在所谓经济暴发之路满地溜达。

1995年是“平庸过渡”的一年,也是“东方主义”十分兴盛的一年。大造声势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使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市民文化的谈资,而其文白夹杂的对白却使得文人们津津乐道古典“文化财”;“反法西斯纪念热”对法西斯霸权的清算,引发了历史反思和时代警惕之心,但不足之处在于某种程度上有扩大化(反西化)之感;“世妇会”使边缘话语一时成为中心话语;东亚经济的泡沫性扩张使人们不再讨论西方价值,而热衷于讨论“东方崛起”和21世纪“亚洲价值”的重要地位。

① 贾平凹著《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

② 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还可以参看张岱年等著《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畅广元主编《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西安:陕西人民,1994年版;朱红文著《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唐君毅著《人文精神之重建》,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



1996 年是“文化退守”和“世俗化”的一年。国学热在主流意识话语支持下达到高峰，祭孔活动、国学书市热、中国历史名人“传记热”、说“不”丛书的民族主义热、晚生代小说、新市井小说的世俗趣味，构成90年代东方主义主潮，反精英的民粹主义获得了全面胜利的自我满足。1996年是知识分子“精神分化”的文化低迷时期，其特征是精神维度深层次的彻底分化，思想观念演变以及对80年代问题的反向式逆转——文本试验由先锋性退回到当下保守性，创作意向由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退回到对小男人小女人文学的热衷，批评立场由群体性、理想性退回到个体世俗性。先锋的衰落与边缘化、新现实主义重新崛起、后现代文化的横向挪用、“文本政治”化书写中国和世界成为这一年文化问题的大致风向标。

1997年邓小平的辞世(2月19日)，使得这一年成为“充满风险意识”的一年。改革前景的忧虑(春天)、香港回归的兴奋(夏天)、亚洲经济危机的肇端(7月2日)、克隆羊技术的震惊(秋天)，使得国人要求稳定的意识空前突出。但是，先锋艺术的全面市场化、拍卖化、文坛“马桥事件”为代表的“文坛官司”，为这一年带来了些嘈杂之音。看客与被看的表演都已不再是文化风景线，而是经济泡沫消散之前的文化泡沫，也是巨型金钱想像破灭之后的巨型文化想像内缩的征兆。

纵观这五年，从中国经济神话到全球金融危机，从信息高速公路到克隆技术的伦理问题，从人文精神到文坛官司，从真正诗人的自杀到散文化的小男小女风景，文化精神确实是发生了全面转型。认真而全面地审理这一转型的正负面效应，当是刻不容缓的了。



三 跨世纪的临界阶段(1998—1999 年)

1998 年是“多事之年”。网络热再造了一个加入世界行列的虚幻景象。中美首脑分别到哈佛和北大讲演,人们对北大百年校庆的热闹尚记忆犹新,在感受克林顿在北大现场直播的风采之后,于9月中旬又在网上看到这位被称为“因特网总统”的丑闻。中国的大洪水使得5000余人丧失生命,全国遭受相当的经济损失。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韩国经济红灯闪烁,俄罗斯卢布贬值总理易主,日本经济滑坡日元贬值,北朝鲜饥荒,亚洲局势动荡,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失和,印尼反华运动,这都使“四小龙”经济神话破灭之后,亚洲总体形象出现危机迹象。

这一年学术思想上一个重要信号,是“人文科学”进一步让位于“社会科学”,并日益被挤向社会思想的边缘。近期出版的“学术前沿丛书”是社会学、法学、经济学、人类学之类的书(知识经济学热潮),文学、美学、哲学进一步处于低迷状态和自说自话处境,这无疑又导致了图书市场的低迷和低俗读物重复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意识形态退隐、精神信仰空白、经济低迷之年,杂色纷呈的“宗教热”动向成为了世纪末新景观。

1999 年的来临,是宗教“热”与世纪末预言相当活跃的一年,是中国大使馆被炸而民族情绪高涨的一年,亦是“跨”的一年——跨世纪、跨国资本,也是受“电脑千年虫”苦恼的一年。可以说到了世纪末,面向“21 世纪的中国”,回顾一个世纪的学术思想并全方位地审理20 世纪的诸多问题,清理一个世纪的精神遗产并准备跨入下一世纪的临界时期,成为学术界反思的又一轮热门话题。



第二节 多重语境中的问题聚焦

90年代的中国镜像问题，是与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与思想褪皮的根本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的。

百年中国，问题纠结。诸如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学术与政治、主义与问题、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全球化与本土化、后蒙理想与后乌托邦、现代化代价与当代人文精神等，使20世纪文化史思想史，正在成为问题生成史和话语变迁史。

正是在这千纪年转换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可能检视一个世纪理论风云中的种种问题，并进而追问中国文化精神向何处去。20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遭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码三次重大的文化转型，^①即从古希腊的两希精神（古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到文艺复兴时期以降的理性精神，再到20世纪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精神。而中国却延续了两千余年汉语文化形态的单线性时代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在20世纪初为西方现代性文化所中断。这就使得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面临总体危机。这一总体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隐含着价值符号的错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思想话语，在不断西化的当代人那里出现了与其生存状态和精神寄托中断的裂缝，因而导致新转型学说——新儒家、

^① 参雅斯贝尔斯著《智慧之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



新道家、新佛家等的出现；而西方基督神学的思想话语资源，与中国人的信仰核心尚存诸多话语冲突之处，难以急切整合。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大抵只能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新融合及当代转型中，重建新的思想话语资源，才有可能使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文化危机得以缓解。^①

在20世纪纷纭复杂的背景中，中国文化发生着根本性的断裂和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使问题的审理变得相当棘手。但是如果化约性地加以‘现象学还原’，则大体上可以将20世纪中国分为五个‘话语演进时代’。即：世纪初的10年代是晚清的‘传统转向现代知识话语时代’；20—30年代则可称为‘自由的学术话语时代’；40—70年代是‘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时代’；80年代是‘诗意的生命感性解放时代’；90代则可以称之为‘消解的游戏话语时代’。这样，本世纪可以分为‘传统—自由—阶级—诗意—消解’五个话语时代的递进，其基本方向是从传统本土话语，走向张扬西学的学术话语。如果这一现象学还原的结果可以成立，那么，五个话语时代的‘根本问题’则相当惊人地不断重复出现，并形成愈演愈烈的当代景观和不断变异的话语范型。

一 “主义与问题”的全面审理

90年代的中国承接本世纪的多种社会思想转化，发生了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因而我们面对‘问题’或‘主义’时，有必要弄清‘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是个体的问题还是群

^① 参韦伯著《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台北，1985年版；中村元著《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体的问题？是国家民族的问题还是全球性世界性的问题？光找到问题还不行，我们被问题所迷惑、所虚幻化甚至虚无化掉也不行。因此，还要找到‘地基’，找到观察问题的立足点和剖析问题的新角度。面对‘主义’审理‘问题’，即搞清‘主义’和‘问题’是90年代学术研究和文化批评起码的要求。

“主义”的厘定。80、90年代引入中国的西学“主义”，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少数话语等“后”“主义”。这些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钳制互相消解，互相掩盖互相撕扯，并为那些文化批评的误读推波助澜而滚滚向前，使人在‘假历史洪流’前遗忘批评家的‘批判’意识和‘揭底’品格，甚至背对问题而成为‘鸵鸟式的批评家’。如何在研究中去正视那些成堆的问题，是切入当代问题的第一道关口。

“问题”的审理。问题相对而言更为复杂，大致可分为以下诸方面：其一，是关于知识分子分化问题。时代在世俗化旗帜中，是怎样使知识分子边缘化而使世俗化成为当代神话的？在学术和思想之间痛苦徘徊的知识分子，怎样走自己的‘边缘之路’？究竟应该怎样书写自己的心灵历程？怎样设计自己的预定理想目标？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自己的精神创造价值呢？其二，是审美文化、大众传媒（或称之为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同知识精英造成了怎样的内在冲突？构成了怎样的张力？双方受到怎样的内在损伤？其三，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出现，带来的关于文化霸权、权力话语、第三世界文化的出路和前景等问题，以及问题的虚假解决现象的历史掩盖条件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在前现代的中国，在思维论、价值论和工艺论层面为怎样的‘现代性问题’所纠缠？其四，是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带来的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历史是客观

事实？历史在阐释中是被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误读？被解读为政治意识形态史、权力话语史，还是文化稗史？其五，是关于世纪末文论问题的清理。这一世纪以来文论出现了怎样的假问题？掩盖真问题甚至剥夺真问题是怎样发生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究竟是否应有尺度？应有怎样的尺度？这种尺度是纯粹私人化的还是可通约的？谁在确定尺度？尺度的消解对文学是怂恿还是伤害？其六，是文艺这种感性化形式，怎样在世俗关怀和终极关怀之间找到一条较好的联通之路？它在既不可能‘代宗教’，也不可能成为‘欲望的表征’之时，如何确立自己的本体？‘诗人之死’与散文热潮在当前中国文化中应该怎样定位？批评家的分化和事件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还有，先锋文艺实验的困境和误区何在？其悲壮感、创新意识、革命性和震撼性何在？这些重要问题，无疑都需要认真地审理，需要在作品和理论上的双重透视中，才能正确解答这些网状般纠缠的问题。

二 文化研究的四重语境

90年代的语境呈现出本世纪最复杂的构成，其归纳分梳因不同方法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谓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它起码由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四重语境所构成：

传统与本土化。其重要标志是众多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厚积薄发，推出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原始儒家、两汉儒家、宋明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当代显学，传统文化读物成为书市的主流读物。在历史的空场，这种传统本土化的格局无疑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意义，然而，其对西学的强劲反拨又使90年代具有浓郁的非西化意味。

意识形态化。这表征为90年代在消解意识形态阶级斗争